

梁实秋的记忆

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(相当于今天的高一),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,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。

清华因地处郊外,消息相对闭塞,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,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。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,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:“清华远在郊外,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。……自五月十九日以后,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。我随同大队进城,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,人越聚越多,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,这时有三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,顿时激怒了群众,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,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。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,恨政府无能,恨官吏卖国,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。”

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,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,章宗祥与曹汝霖、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,是五四运动的靶子。运动爆发后,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,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,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搞得稀巴烂,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。运动过后不久,章宗祥的儿子就害猩红热去世了,梁实秋对此很伤心,特地在《清华八年》一文中专门提及。

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,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,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。1949年去台后,陈长桐相继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、中国银行总经理、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,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。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:“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,他严肃而又和蔼,冷静而又热情,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,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。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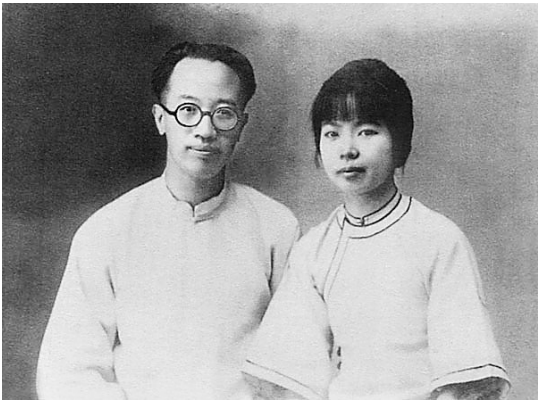
陈长桐出国后,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,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。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,一次学生开会,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,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。恰巧这时有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,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。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,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。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,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,舆论哗然,罗只好黯然去职。短短几年,清华三易校长,实不多见,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,所以后来经常自诩“九载清华,三驱校长”。

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,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中也有所表现:“他(闻一多)对于爱国运动,热心是有的,却不是公开的领袖。……闻一多则埋头苦干,撰通电、写宣言、制标语,做的是文书的工作。他不善演说,因为他易于激动,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,反倒说不出话。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,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,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。”

其实,正是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,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。



罗家伦先生



年轻时期的梁实秋夫妇

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

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,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《新潮》月刊,鼓吹新文化运动,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。五四期间,罗家伦亲笔起草了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,提出了“外争国权,内除国贼”的口号,并在5月26日的《每周评论》上第一次提出了“五四运动”这个称呼。

1931年8月26日,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,几十年后,这段回忆才在台湾《传记文学》公开发表。《传记文学》在“编者按”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:“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二十年口述,马星野先生笔记,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,一直未公开发表。顷承罗先生长女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,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。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,孝思不匮,编者谨致谢忱。”

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,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,是后人研究、了解五四运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。文章篇幅很长,不能一一转述,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。

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。据罗家伦介绍,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,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,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,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。

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,5月3日,清华学校举行一个纪念活动,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,罗家伦也去了,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。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,事情起了变化,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。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,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,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;后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

刀,要在会场上自杀,还有一位学生,也准备断指写血书。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,决定第二天(即5月4日)联合各校同时行动,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员负责召集,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。

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,会议快开完了,决议也已经确定。罗家伦当时还埋怨许德珩,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,现在改了期,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?可埋怨归埋怨,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。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,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,约定第二天下午一点在天安门集合。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:

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,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,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,一个是我,一个是江绍原,一个是张廷济,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,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,第二天的早上,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,送给各国使馆。到下午一点钟,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。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,因为预备各种文件,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。

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。1919年春,巴黎和会中国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,北大学生气愤填膺,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,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,作为发通电的经费。通电发完后,电报费还剩下300元左右,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,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。

决定5月4日起事后,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300多元钱买了一些竹布,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学生帮忙,做了3000多面旗子。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,剩余的都送给了别的学校,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。后来罗家伦专门解释此事说:“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,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有这么多钱去做旗子呢?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。”

亲历者眼里的『五四运动』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

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,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。多年以后,许德珩写了一篇《回忆五四运动》的文章,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。

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、痛殴章宗祥后,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,学生们一哄而散,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。许德珩在文中写到:“我和易克嶷(北大学生)被捕后,他们故意侮辱我们,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上,拉进步军统领衙门。记得在板车上,易克嶷还在说:‘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。’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,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,市民1人,共32人。”

另有一种说法是这32人都是学生,其中北大20名,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,工业学校2名,中国大学1名,汇文大学1名。具体名单如下:熊天祉、梁彬文、李良骥、牟振飞、梁颖文、曹永、陈声树、郝祖龄、杨振声、萧济时、邱彬、江绍原、孙德中、何作霖、鲁其昌、易克嶷、许德珩、潘淑、林公顿、易敬泉、向大光、陈宏勋、薛荣周、赵永刚、杨荃骏、唐英国、王德润、初铭音、李更新、董绍舒、刘国干、张德。

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,里面只有一个大炕,摆着两个尿桶,臭气熏天;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,以证明还活着;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,在屋里放一桶开水;每天中午放风一次,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,上上厕所。

据许德珩回忆,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,也很同情他们,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。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,说些服从长官、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,学生们听得不耐烦,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:“天不怕,地不怕,最怕牢头来训话。”

5月7日中午,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。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,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,蔡元培先生也在现场。广场摆着五张方桌,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,蔡校长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,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

许德珩